

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樊锦诗

学苑论衡

内容提要

深入研究与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等精神标识，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诸多精神标识，比如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等。挖掘和弘扬这些精神标识有利于我们感悟古人的智慧、守护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影响力，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更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神动力。

蕴含着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谈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时指出：“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

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丝绸之路的贯通、河西地区的安定和敦煌的开窟造像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河西之战扫清中原通向西域的障碍后，公元前111年，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方面，在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方面，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与此同时，世家大族、文人学者、行客商贩、农夫工匠、画工歌伎等迁居于此，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还传入了儒家和道家文化，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放眼敦煌石窟史，也有无数体现开拓精神的人物，特别是一批护法护法的高僧。据公元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龕碑》记载，莫高窟最早的两个洞窟始于公元366年，由乐僔和尚和法良禅师先后创建。此后无数无名的打窟匠、画匠、塑匠，在公元4—14世纪的1000年间持续开拓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在1700多米长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窟735个、塑像24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使莫高窟成为举世无双的佛教石窟艺术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宝库。敦煌文化遗产中记录的这些伟大开拓者的足迹，集中体现着中华文明坚强刚毅的开拓精神。

蕴含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互汇”“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敦煌位于古代中国西部边陲，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汇处。以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

文献为代表的敦煌文化遗产，既以中华文明为本位，又以开阔胸襟和恢宏气度广泛吸纳和融汇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多种外来文明，体现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特征与共生精神。

敦煌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建筑、历史、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医药、礼仪、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石窟艺术和文献，而且融汇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如5世纪上半叶的洞窟中绘有希腊爱奥尼柱式，是中亚接受了希腊文化后又影响敦煌的结果。莫高窟早期禅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的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画中的佛陀、菩萨形象，象鼻人身的毗那夜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图像，融合了犍陀罗、马图拉、笈多等不同元素的艺术风格。还有大量佛教译经，这是来自南亚印度的影响。壁画中身着不同服饰的各国国王形象，公元642年的壁画中表现的康国女子表演的胡旋舞，这是中亚文化的呈现。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银币、藏经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经典、祇教女神图像、景教经典，这是来源于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这些例子，都说明敦煌莫高窟是中外多种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气度。

蕴含着中华文明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兴盛和繁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长期持续地交融荟萃。不仅有外来文化的引进来，也有中华文化向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漫润。历史上由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的儒家经典、律法、医学和蒙书，传播着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正义价值、人本情怀和育人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济世安民、泽被四方的人文精神。

敦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的儒家经典写本，共有30多种、300多种，抄写年代为魏晋到五代宋初，比如《尚书》《论语》《诗经》等，以及《论语注》等现已失传的古书。此外，还有史部典籍传入西

域，比如，《史记》写本、《汉书》写本以及元明时期就已失传的《春秋后语》写本等，说明儒家文化和中华经典对西域地区有着持续的影响。

唐律集唐以前中国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敦煌的唐代律法文献，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写本。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是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细则。这是中国隋唐时期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敦煌藏经洞所出“律”类文献写本，有《名物律》《职制律》等。敦煌藏经洞所出“格”不多，有《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开元户部格》残卷等。

敦煌传到西域的医学类文献写本有医经、本草、医方等三类。医经文献如《伤寒论·辨脉法》残卷，这是一种最早完整的《伤寒论》现存传本。敦煌藏经洞中比较重要的本草类文献有《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此残卷首卷亡佚三四行，后面基本完好。敦煌藏经洞中，医方类文献残卷数量最多，共保存医方34个。

敦煌还发现了传入西域的蒙书和家训。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蒙书，依其内容而言，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等积字成篇的基础识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园策府》《杂抄》《贤赞》等兼顾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教材；还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百行章》《夫子劝世词》等训诫为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教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敦煌地区教育繁荣的基本面貌。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敦煌学属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面向未来，我们要持续从敦煌文化中提炼出中华文明多方面的精神标识，开展多种形式国际性展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同时，用好数字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并与各国学者一起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通过文化传向世界展示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文化形象。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全国，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始终如一，激励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更好让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如何赓续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实践是一个范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三十二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是一部展开的大百科全书，仅就景观而言，需要保护的就包括沿线的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建筑景观、航运景观、民居景观等16种。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实践丰富了文化资源内涵和外延，也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从“文物保护”层面提升到“文化遗产保护”层面。具体来看，第一，在关注文化要素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自然要素的保护。中国大运河是结合不同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加以人工开凿建成的，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奇迹，因此要将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同时保护。第二，在关注静态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活态文物、动态文物的保护。大运河是流动的，船舶还在航行，人们仍然居住在沿线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中，这些也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第三，在关注古代文物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20世纪建造的、当代遗产的保护。大运河拥有完整的生命历程，例如近年建造的亚洲同类工程规模最大的淮安水上立交和江都水利枢纽，均具有重大的科技和文化价值，应该纳入保护，防止出现历史断裂。第四，在关注一座古建筑、一处古遗址，后来由点及面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城市的同时，也要关注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所形成的线形遗产、文化线路。中国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构成充满活力的交通廊道，从古至今发挥着国家物资运输和水资源调配的重大功能，这也是应当在保护中予以重视的。第五，在关注气势恢宏的古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保护的同时，还要关注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运河沿线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中，分布着各具特色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有些虽然看上去朴素无华，但寄托着人们的乡愁，也应该加以保护。第六，在关注物质要素保护的同时，还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运河沿线地域的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区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加大保护传承的力度。

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再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过去十年，大运河保护传承中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几代人付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世界认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谱写了新篇章，为我们更好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良性循环提供了启示。一方面，要以传承为保护目的。我们要认识到，不能仅仅强调保护，如果一座古建筑维修好了以后，为了保护把它锁起来，实际上会腐朽得更快；也不能只强调利用，因为文物建筑、历史街区等如果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不合理利用，将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损毁。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传承，就是把我们先人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代，“健康”地传给子孙后代。另一方面，要以人民为保护主体。过去，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数量比较有限并且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今天，在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形势下，大量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等都逐渐被列入保护之列，人们居住的房子、从事生产的厂房、休闲购物的场所都可能是需要保护的主体。大家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政府特别是文物部门的责任，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要唤起广大民众的保护意识，使更多民众加入保护行列。当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才最安全、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保护。

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要做好传承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来源于生活，也发展和繁荣于生活，它们本身是有生命的；它们的价值也并不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本身存在的，只是需要我们悉心研究和弘扬。因此，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态，是让其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今天，要努力使历史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再次展现出独特魅力，真正得到人们倾心呵护，进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民众，再吸引更多民众加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列。这样才是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态，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良性循环。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

单霁翔

为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学术力量——“三线建设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要

周 进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国防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但它给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无穷的精神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精神，当代中国研究所等主办的“三线建设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重庆涪陵举办，与会者围绕进一步贯通历史和现实拓展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等展开研讨。

与会者表示，三线建设是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党性教育资源，一定要挖掘好、运用好。三线建设研究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一座富矿，广大研究工作者要继续深入下去，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断发掘其对当前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借鉴意义，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服务，为传承红色基因贡献学术力量。

积极总结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简评

张艳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经验十分丰富，蕴涵着不少政治智慧，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资源。胡宗山撰著的《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丰富内涵、经验教训、当代价值进行了系统

研究。该书对我国先秦至晚清的乡村治理演变进行了总体扫描，详细评估了乡村治理在古代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系统总结了古代乡村治理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通过对古代乡村治理的研究，该书展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加强乡村治理具有借鉴价值。

贡献多元视角 提供丰富材料

深化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

杨艳秋

华文明起源、探索中华文明基因留下了宝贵资料。浩繁的史籍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重要载体，《春秋》记载了242年的历史，《史记》叙述了3000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时间跨度达1362年，我们今天熟知的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更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文明的连续记录。这些都是对我们民族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造就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意识。这些“过去”通过历史记忆的传递，以多种方式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并通过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继往开来的思想生成模式，造就了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思想演进特性。思想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经过夏、商、西周的长期酝酿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为代表的“百家争鸣”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多元竞流、蓬勃发展的阶段。诸子百家思想观念虽各

不相同，但所争鸣的诸如天人关系、伦理准则、政治秩序、社会规范等都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命题，并提出了天、道、性、命、仁、礼、法等核心概念。这些命题和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后世思想发展提供了资源，更开辟了基本的问题领域。随着秦汉政治大一统的实现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相对稳定的中华思想体系逐渐生成。此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各自时代背景、现实需求，通过对既有命题和概念的再诠释、再发展，提出相应的思想学说乃至新的体系。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阳明心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变革化，中华文化因此而连绵不绝、高峰迭起。这种继往开来的思想生成模式，保证了中国古代思想在传承演变中的稳定性，也有助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更新，造就了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思想演进特性。

与时俱进的文化演进品格，造就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文化发展方式。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不仅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塑造出富有高度历史感、时代感的中华文化。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文化，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继承和创新的特质。中华文化是在一代代增损损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的，展现出一代代革故鼎新、不断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应物变化的与时俱进品格使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能够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髓，又能够不断地吸收和融合新的元素，从而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导“革故鼎新”、“主张”“达变革新”。几千年来，这种变革基因使得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中华文明也因此具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从而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